

黄中模 王雍刚 主编

# 楚辞研究 成功之路

——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

三峡经济文化丛书

《楚辞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三辑



3

重庆出版社



I207.223-53  
H904

黄中模 王雍刚 主编

# 楚辞研究 成功之路

——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

三峡经济文化丛书

《楚辞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三辑



1273/05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黄中模,王雍刚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12

ISBN 7-5366-5123-6

I. 楚… I. ①黄…②王 II. 楚辞-文学研究-文集 N. I207.2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9912号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

黄中模、王雍刚 主编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52 千 插页 2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5123-6/I · 1003

定价:25.00 元

# 目 录

## 当代楚辞学领域成功者的画廊——前言并代序

- ..... 黄中模 王雍刚 (1)
- 我与楚辞..... 四川师范大学 汤炳正 (8)
- 我的楚辞研究..... 北京大学 林 庚 (15)
- 与楚辞研究同道谈心..... 北京大学 褚斌杰 (29)
- 常研常新,永驻辉煌——我与楚辞结缘的经过与心得
- ..... 南京大学 郭维森 (38)
- 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南京大学 周勋初 (46)
- 楚辞与人类文化——我的楚辞研究
- ..... 淮阴师范专科学校 萧 兵 (59)
- 在中国文化巨星屈原的光辉照耀下
- ..... 中国民族文物保护协会 王雍刚 (71)
- 击水楚辞长河中..... 重庆师范学院 黄中模 (74)
- 二十年楚辞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 南通师范学院 周建忠 (96)
- 我与楚辞的因缘 .....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龚维英 (109)
- 挑战和超越——谈谈我的楚辞研究
- ..... 安徽师范大学 潘啸龙 (121)
- 饮水思源,深情寄语 ..... 西北师范大学 郑 文 (132)
- 回首碌碌四十年 ..... 西北师范大学 赵逵夫 (141)
- 我与楚辞研究 ..... 复旦大学 徐志啸 (153)
- 不重虚名,但求务实 ..... 云南大学 殷光熹 (160)
- 弘扬屈原精神的教书先生 ..... 辽宁大学 王延海 (172)
- 楚辞研究琐谈 ..... 陕西师范大学 吕培成 (178)

执着的追求,艰难的跋涉 … 哈尔滨师范大学 戴志钧 (190)

不可解脱的屈原情结——我研究屈原与楚辞回顾

……………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蔡靖东 (203)

以史论世,旧学新构

…………… 黄石教育学院 冀凡口述 广南整理 (216)

在楚辞研究与教学的途中 … 湖南师范大学 颜新宇 (223)

偶然与必然——我的楚辞研究

…………… 《云梦学刊》编辑部 江立中 (233)

何日我再来 …………… 浙江省社科院 董楚平 (243)

无悔的选择 …………… 浙江师范大学 黄灵庚 (249)

弟兄共治楚骚 …………… 浙江海盐县 陆天华 (264)

从《风赋》研究到《楚辞论析》

…………… 《中州学刊》编辑部 汤漳平 (275)

我与楚辞总有缘 ……………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蒋南华 (284)

我一生研究楚辞的成绩

…………… [台湾]台南成功大学 苏雪林 (288)

千里结缘,治学获益——我与楚辞的因缘

…………… [台湾]成功大学 陈怡良 (298)

楚辞研究三部曲——从修习、探索到教研

…………… [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史墨卿 (307)

悲莫悲兮读楚辞,乐莫乐兮更相知

…………… [台湾]淡江大学 傅锡壬 (320)

我与楚辞结下终生之缘 …………… 台湾师范大学 高秋凤 (323)

我的楚辞研究和见解

…………… [日本]德岛大学 竹治贞夫 (335)

后记

…………… 黄中模 (344)

# 当代楚辞学领域成功者的画廊

## ——前言并代序

黄中模 王雍刚

### (一)

“宇宙绵邈，黎献纷繁，出类拔萃，智术而已。”这是我国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对于著作者的崇高礼赞。我国历代“出类拔萃”的志士仁人为祖国文明献身于智术事业，著作浩繁而充栋汗牛。然而岁月如长江逝水，又不知卷走了多少诗人墨籍。但崛起于南中国的以屈宋诸骚为代表的楚辞，即如“日月经天”，在世界东方天庭上辉丽万有，~~辉映被辞人~~，从而萌生了号称中国“显学”的楚辞学，如雪里苍松，历久不衰。到了当代，从事屈学研究，更如夜空繁星，为中国文化发展史嵌绘出颇为壮丽的一页。

当历史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世纪之初，到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世纪之末，在近百年的社会发展浪潮中，中国楚辞学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代社会的激荡的风云变幻，为当代楚辞学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根基，促使一大批楚辞学者的治学走上成功之路。

当代楚辞学领域，由于时代的启示与需要，形成了研究热点多、学术争鸣之风炽盛的局面，其硕果累如贯珠，拳头产品金声而玉振。真可谓盛况空前，色彩斑斓。然而这一奇迹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来自“人”，是由于有一大批楚辞专家辛勤的著述！

据相关专著粗略记录，当代发表过有影响论文的楚辞学者达 170 余人之多。而其中多以专著而立者。据有的专家的统计：仅 1978 年至 1990 年间大陆出版的楚辞学著作，就达 105 种，何况楚辞学在台湾、日本也是颇受青睐的热门学科，其成果尚未列于其中。这给祖国文化及千秋万代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出类拔萃”的精神财富，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一大奇迹。

## (二)

为深入展示这一壮丽篇章，总结 20 世纪、特别是当代楚辞学者在成功道路上的业绩，给渴望升堂入室的来者提供借鉴，并为渺渺来世储存最珍贵的史料，使后代欲“知人论世”者有迹可寻，秉笔直书者有据可依，《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编委会，特从当代目前尚健在的楚辞专家中，组织一批海内外知名教授和学者，总结自己的研究楚骚的经历与心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已品列成书，杀青付梓。总观其成，本书有如下显著特点：

(一) 广泛的代表性。当代楚辞学领域呈现出著作丰富、论文浩瀚、热点纷呈、长盛不衰的显著特色，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研究队伍中人才荟萃，如繁星满天。为了广泛地反映这种特点，编者经过精心策划与研究，用一般号召与重点约稿的方式，组

织稿件。及至定稿之日，原编辑约稿之目的已基本达到。除了少数学者因特殊的客观原因未能如约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均踊跃赐稿。从收录的文章看，本书作者有广泛的代表性：

首先，健在的老一代专家：如一百余岁高龄的台湾的苏雪林教授，年近九旬的北京大学林庚先生、四川师大的汤炳正教授（写稿时还健在）、西北师大的郑文教授等都是学界耆宿、誉满文坛、佳作丰硕、风调独绝的专家，他们是新中国老一代楚辞学者的代表。

再者是有一批年过花甲，有的甚至到了古稀之年，有的已退休，有的还坚持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楚辞专家，如南京大学的郭维森教授、安徽社科院的龚维英先生、日本竹治贞夫教授，他们虽然已退休，但在晚年，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气概，潜心著作，笔耕不已。一批专家虽然年过花甲，但“壮心未与年俱老”，因工作需要，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并热心楚辞研究，如淮阴师专的萧兵、北京大学的褚斌杰、台湾高雄师范大学的史墨卿、云南大学的殷光熹等教授都是誉满神州而继续驰骋在楚骚的原野上的学者，他们的著作硕果累累，达到了推陈出新、独辟蹊径、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本书作者中，还有一批是出生于40年代的楚辞学者。他们成长于新时期，指点江山于当今学坛。如安徽师大的潘啸龙、复旦大学的徐志啸、《中州学刊》社的汤漳平、《云梦学刊》编辑部的江立中、台湾成功大学的陈怡良等教授，乃是如此。他们学贯中西，思维敏捷，勇于创新，成绩卓著，是中国楚辞学界的栋梁之材，也是这一年轮的楚辞学者代表人物。

更可喜的是在本书所收录文章的作者中，有一些是出生于50年代的年轻的楚辞专家，如江苏的周建忠教授，湖北的蔡靖泉先生，台湾的高秋凤女士，他们是年轻一代楚辞学者的代表。



其作丰硕，其思敏慧，其词真切，其文飞彩。他们才华横溢，激流勇进，激扬文字，饮誉骚坛。堪称我国楚辞学界新生力量的代表，可望金声玉振，响逸神州。

本书收录的上述不同层次的中外卓越的著名楚辞学者的文稿，以其丰硕的著作为基础，以其成功的治学经历为话题，以其深刻的哲理为精髓，以其生动的翰墨为文章，载入本刊。这一篇篇生动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当代海内外楚辞专家的代表人物在楚辞学领域建立的辉煌的业绩和他们的崇高风范，这可令后学观文仰止，心向往之。

（二）厚重的承传性。楚辞学如其它文化现象一样，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积淀的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当代的楚辞学是在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但是由于当代楚辞学者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没有传播和发展，这种继承与发展的密切组合起来的承传作用，鲜明地体现在本书作者的文章中。他们在讲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总是念念不忘老一代学者，如褚斌杰之于游国恩教授，周勋初之于胡小石先生，郑文之于章太炎先生及其四师，殷光熹、王延海、吕培成、黄中模等念念不忘受教于姜亮夫先生门下……他们饮水思源，不忘传统。这都说明老一代或较年轻一点的楚辞学者，都继承了上一代的治学传统和方法。同时他们由于受当代社会思潮及理论的影响，在治学道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又有所创新和发展。他们善于吸收新的营养，把楚辞学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面向世界，勇于突破，取得了与前人不同的新成果。这种厚重的承传性，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热爱屈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另一方面更标志着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发展和传续祖国文化所作的不懈努力。每篇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他们在为弘扬中华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的过程中，所克服的重重困难的艰苦历程。每篇文章都是一首热爱中华文明的诗篇，它们汇成了一曲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高亢而雄伟的颂歌，体现了当代楚辞专家热爱祖国和爱我中华文化的崇高精神。

（三）历史的科学性。本书收录的文章的作者皆为现存于世的当代著名的楚辞专家。他们本着对祖国对人民和对科学负责的精神，真实地记录自己在数十年研究楚辞的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具有高度的历史科学性。他们的一本本研究楚辞的煌煌大著在海内外学术界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在那些蜚声中外的巨著背后，不知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未与外人道及！读者如果了解这些著作出台的内幕及作者的良苦用心，就可更深入读懂他们的著作，避免许多误解。

如果你能认真披阅这些文章，就可以知道在这些专家的著作背后，隐藏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无书可寻，收集材料，著书立说，日夜抄书者有之；下放劳动，身处荒野，柴门之内，煤油灯旁，攻读楚骚，遂成大业者有之；不远千里，负笈从师，力排众议，激流勇进者有之……这些文章，记录了作者在 20 世纪社会浪潮翻滚的不同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中，研究屈原及楚辞的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20 世纪的时代风云变幻的背影，有一定的时代性。因此本书具有高度的历史科学性和历史价值。特别是其中许多文章的作者系当代负有盛名的老教授，老专家。许多文章，是他们抱病写成的，有的甚至由于在病中不能提笔，是用口述，请人笔录品列成文的。如当代楚辞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汤炳正先生，是在 90 高龄而且抱病的情况下，挥毫成文的。最近因病去世，本文成了汤先生的绝笔之作，其珍贵价值，自不待言。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的苏雪林教授，是海峡两岸学人

共仰的学术大师，在台号称“文坛国宝”。她的文章是在其 102 岁高龄之际，在疗养院病榻前一气呵成的。她认为自己写的回忆文章，是她“一生研究楚辞之成绩”的总结。其历史价值又岂能尺寸计？

（四）现实的启示性。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需要在新世纪的社会发展中发扬光大，楚辞学精神应当昭示后人，弘之再精。本书收录的文章，皆本着对现实社会和后世学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了他们的做人及治学的道路和心得，既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发扬，也有失败的教训，可供借鉴，为从事科学研究写出了许多警示性的箴言。如果来者能正确认识与运用其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便能为自己在 21 世纪从事科学、特别是楚辞研究，起到一些启发与促进作用，可助后学成功。使楚辞学在新的世纪能发扬光大，结出更丰盛的硕果。

“一代楚骚多寄托，十分沉著见精神”。本书的上述特性，赋予了它具有中国楚辞学史上第一部由作者自撰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当代楚辞学史的性质，从中可看到楚辞学在当代的潮涨潮落的状况，从中映出了当代楚辞学领域成功者的风貌，犹如一道画廊，展示了他们辉煌的业绩，奏出了 20 世纪祖国文化战线上的响彻云天的凯歌。

### （三）

本书的编辑体例是：

（一）只收录自组稿以来，尚健在世的楚辞学者的文章，个别已交稿而后去世的专家，其文当然刊载其中。

（二）本书刊载的标准，是本着人以文传的精神，在当代楚

辞学界以其著作而有突出贡献者，其文方得收录。其中大多数作者皆因有楚辞学专著而鸣于世；少量无专著者，因其发表的系列研究屈原的论文在社会上富有影响，因而得以收录。当然还有少数有影响、有贡献而且健在的楚辞专家未入录本书者，其客观原因颇多，或未如约赐稿，或因病在床，或由于其它原因未赐文稿，只得付诸阙如，有待他日再版另行补入。望海内外诸君见谅。

（三）编者尽量忠实于原稿，只在一些原则问题和字句上作少量的删改。

（四）在每篇文章之前，有编者按语，对作者的生平、简历与著作情况作简单介绍，以便读者知人论世。

（五）本书为《楚辞研究与争鸣》——楚辞学集刊第三集，（该刊第一集由北京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二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为了出版方便，本书列入《三峡经济文化丛书》由重庆出版社予以出版。

楚辞学集刊第三集

## 我与楚辞

四川师范大学 汤炳正

**编者按：**汤炳正，男，汉族，1910年1月出生，1998年4月4日去世。曾任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教授。1950年后任川北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先生于抗战时期曾著有《屈赋注》、《屈赋新章句》，1980年后出版的专著有《屈赋新探》、《语言之起源》、《楚辞今注》、《楚辞类稿》，主编过《楚辞研究》两集，另有《楚辞赏析》、《剑南忆旧》等专著也即将出版。加上研究楚辞的论文20余篇，其著作共达200多万字。

我与《楚辞》结缘，是比较晚的。记得少年读书时，家塾藏书，经史子集都有一些，然无《楚辞》。老师讲课，也不及《楚辞》。其实，一位远房叔叔从曾任京官的亲戚家得了一部《楚辞》，置诸案头，对我说：“这书读起来很有趣味。”但也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回忆起来，其书系古刊大本，纸色暗黄，有似现在传世的芙蓉馆《章句》本。可见，当时用以教育青少年者，唐诗宋词而外，很少涉及《楚辞》。我师事太炎先生时，先生亦未尝以《楚辞》相授。

我跟《楚辞》产生不解之缘，是在抗战时期，尤其是家乡

沦陷、逃亡西南的年代。这也许是我的流亡生活与屈子产生了共鸣。但其时，我正专攻语言文字之学，对屈赋还无暇顾及。虽偶尔讽诵吟咏，但跟学术探讨之间，还隔着一道万里长城。

我现在体会到，对任何文化遗产的研究，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时代的政治，时代的思潮，时代的情趣等等，无一不渗入学术研究领域。抗战时期，郭沫若、闻一多等，曾掀起研屈高潮。他们都能以新的观点方法，分析屈赋，塑造屈子的伟大形象。他们的成果，曾在当时抗日的政治斗争中，起过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我任教于贵阳师范学院，正值抗战刚刚结束，反内战的思潮正在高涨。学校要我为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出乎我意料之外，开课不久，其它各系的学生，都纷纷参加旁听，挤满了教室；教室坐不下，就自带凳子，在室外露天听课。但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并不是由于我讲课有什么魔力，而是弥漫于青年当中的时代思潮，跟伟大诗人屈子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某种默契而使然。而正是这种客观形势，竟促使我由教语言学转到教屈赋，由对屈赋的讽诵吟咏进一步对屈赋进行钻研探索。这无疑是我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了讲课的需要，我写过《屈赋注》；为了理清屈赋的思路，我又写过《屈赋新章句》。不过由于我是专攻语言文字学的，故研屈的开始，仍是从语言文字入手。

我在研屈过程中的第一篇论文，是探讨《招魂》“些”字的来源。在当时，用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楚辞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自认为是开辟了屈学新路。那是1948年，我正任教于贵州大学中文系。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耳濡目染，使我意识到屈赋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我当时曾搜集记录苗族词藻几大本。我对门宿舍的杨汉先君，是苗族人，曾为调查苗族民俗，走遍了西南各省。杨与我素有相当的友情，一天闲谈中，提



到他在云南白苗中参加过几次招魂仪式。而其招词的句尾，必收以“写写”二音。此事对我启发极大，经过反复探索，得出《招魂》“些”字本为“此此”重音的结论。这篇论文，当时曾在梁漱溟主办的重庆“勉仁文学院”学报创刊号上发表过，可作为我研屈生涯中的一个纪念。有人认为，从第一篇研屈论文看，已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倾向，那就是重视新资料（包括出土文物）的运用和长于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但我个人的体会，新资料固然重要，但必须与传统的旧资料相参稽，始能显其纠谬补缺之功；以语言文字为突破口固然重要，而在破门以后，还有个升堂入室问题，否则就会得其精审，失其恢宏。

但是，建国以后，我的研屈生活并没有能按照自己的设想顺利前进。几十年来，曾经过几次长时期的间歇，并碰到不少难以超越的困扰。开始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接着又是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肃清反革命等等，把我的如意算盘，冲击得稀烂。整整10年的时间，研屈工作简直是空白。这其间，心情之苦闷，是不言而喻的。直到1962年《高教六十条》颁布之后，文化界才出现思想松动的局面。而我的第二篇研屈论文《屈原列传理惑》也于这时写成，并发表于中华书局主编的《文史》创刊号上。接着，1963年我又撰写了《楚辞成书之经过》，发表在《江汉学报》上。这两篇东西，颇得国内外屈学同仁的赞许。通过这两篇论文的撰写，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新资料的运用固然有助于新结论的获得，但对人们用惯了的旧资料，如果有了崭新的理解或独到的阐释，同样会得出创造性的结论。而且离开语言文字学的范畴，而“属辞比事”，纵横参验，于屈学研究同样大有用武之地。但尽管个人的信心十足，而突如其来的时代劫难，史无前例的“文革”，使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从此又是一个10年的空白。

在“文革”中，不仅研屈无缘，且性命难保。更不幸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又恰恰在“文革”的末期，狠狠地折磨着我。这时期，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该死的死了，该病的病了，该流放的流放了，天下渐渐太平，而我也得以请假在家养病。其时，我对那部劫余的残本《楚辞》，只能抚之以慰情，未敢展卷而畅读。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气氛压人，心有余悸，而且我那时的病情，连报刊上的大标题都不能读，一读病就翻。难道这正是读书人应有的下场？难道我终于不得不与屈赋绝缘？有人说，对一门学科思维固然是重要的，而对这门学科的深厚感情与浓烈兴趣，是决不可缺少的因素。然不身历其境，是很难体会出其中至理的。可以这样说，“文革”10年，我与屈赋的关系，在科研上是空白，而在感情上并不是空白。它不仅填补了我在文化沙漠中思想上的虚无空寂，而且在屈子抗拒邪恶的精神支持下，常常使我度过了难于忍受的遭遇。因此，从1976年开始，我终于带着这种感情，重理旧业，拖着久病的身躯，在研屈的道路试步前进。

记得1976年全国地震警报频繁的年月。这年夏，我与老伴潘芷云带着几本《楚辞》经由溆浦，奔向她的老家湖南武冈避震。在屈子流放之地，读屈子抒愤之篇，自觉体会特深。第二年，即1977年的春末，回到了成都，病情似乎略有好转，立即全身心地致力于研屈。从探讨《九章》后四篇的真伪问题开始，遂一发而不可遏止，终于于1984年集结出版了《屈赋新探》与《楚辞类稿》等。其书多蒙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并对其学术风格有所论列。但时代的局限，学识的不足，给著述带来的缺陷，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说贡献，只能说在我个人的治屈道路上，对屈子的身世行踪、政治思想、辞赋创作、艺术特征等方面，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已。至于我的学

术个性还是看得出来的，那就是乐于“碰硬”。我这里所谓的“硬”，有两层意思：第一，“硬”是指具体的史实性问题，而非抽象的观念性问题。第二，“硬”是指屈学史上的大是大非大难问题，而非一般性问题。我尝自笑，听说中国的武术有软功、硬功之别。如果说软功是靠辗转腾挪取胜，硬功则是靠体格的实力争强。而我自己似乎是选择了后者。然而由于自身的先天气质虚弱，这个选择，未必得当。而且，我虽然重在“硬功”，而在确凿可靠的事实面前，也从未忘却以理论性的剖析为归宿。这一点，细心的读者，自有体会。

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文革”结束以后，在振兴屈学的过程中，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1982年端午节在湖北屈原故里秭归举行的首届全国性的屈学讨论会上，我的发言针对1953年以来名为纪念屈原而实则贬损屈原的极左论调，首先发难，提出了反驳（发言稿《草宪发微》，后收入《屈赋新探》）。我觉得，这在学术界刚刚开始解冻的当时，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壮举。当然，我的态度仍是以事实服人，并非单纯“以理服人”而已。

第二是1984年的端午节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屈原问题讨论会。我的目的是组织屈学界，对当时国内外有些人试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屈原否定论”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价。我在大会的前夕，曾写了《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一文，发表在《求索》杂志（后来收入《楚辞类稿》），有针对性地驳斥了何天行的谬论。何天行是胡适的门人，记得胡适当年曾认为在文化遗产的探讨中，“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但我今天则认为，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与其过而弃之，不如过而存之”。我也知道，胡氏的说法，是为有而发，并非无的放矢，但在古文物大量出土的今天，已不断地